

中國開放戰略轉型 與香港經濟轉型的動態關聯

——兼論國家新開放戰略中的香港地位重塑

戴金平 蔡赤萌

[提要] 中國內地改革開放戰略轉型與香港經濟轉型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在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實施中，香港是內地對外貿易的助推器、引進外資的源泉、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橋頭堡，成為內地對外開放的“窗口”，並促成香港國際金融、旅遊、貿易和物流中心等地位的建立，成功轉型為服務型經濟。在開放型經濟發展戰略實施階段，正值香港回歸，兩地經貿聯繫更趨緊密，香港服務業向高端化發展，四大中心功能開始升級。在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構建階段，香港成為內地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試驗田、中國企業“走出去”服務平台。隨著內地全面對外開放，香港傳統優勢正在弱化，唯一出路是再次轉型與升級，提升傳統中介功能，打造高端專業服務平台。

[關鍵詞] 香港經濟轉型 中國開放戰略 動態關聯 地位重塑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7) 02 - 0037 - 13

近年來香港經濟發展態勢正面臨諸多新挑戰：無論是本地生產總值增長速度，還是進出口增速，亦或是景氣指數，都呈現了上個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最弱表現；香港與內地經濟合作關係從互補走向競合，合作交流中摩擦增多，激進本土乃至“港獨”思潮泛起。如何正確認識香港與祖國的經濟關係，關乎香港的未來，也關乎中國長期穩定發展的大局。認識這一關係的關鍵，是要把握好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作用，其基礎前提是要客觀認識香港經濟發展與內地改革開放發展之間的關係，釐清兩者相互促進的邏輯，這也是解決香港當前困境、尋求新突破的關鍵。

一、文獻綜述

關於香港與中國內地發展之間的相互經濟關係研究，焦點之一是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上。早期的研究強調香港在中國內地對外貿易、吸引外資中的中介功能，以及管理

經驗的引進上；後來逐步擴展到協助內地“走出去”、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等平台功能以及結合國家五年發展規劃論述香港的地位作用。馮邦彥從對外貿易、招商引資和促進沿海開放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三方面闡述了香港在中國對外開放中的促進作用；^①高祀仁回顧改革開放 30 周年中國對外開放進程，指出香港在中國對外貿易投資中發揮著積極先鋒作用、持續推動作用和獨特的橋樑作用。^②香港策略發展委員會秘書處總結香港在內地改革開放初期的主要作用包括資金來源、引入市場經濟制度、“引進來”的橋樑、境外集資平台等，提出要思考香港未來對國家發展應發揮作用。^③封小雲研究認為內地對外開放引致香港經濟回歸中國，香港成為中國內地最大的進出口港、第一大外資來源地、華南地區出口導向生產基地的龍頭，其經濟週期與中國內地經濟週期呈同步性。^④張明系統分析了近 10 年香港和內地在商品貿易、服務貿易、FDI 和證券投資等方面資金流動趨勢，指出兩地間貿易和投資的規模不斷增長，結構也發生了顯著性變化。^⑤Yun-wing Sung 從香港作為市場需求方、貿易中心和連接紐帶三個角色論述了香港在內地對外貿易和招商引資中的地位和作用。^⑥馮國經、王冬勝、關家明、王于漸等分別從全球供應鏈格局變革、集融資和財富管理平台、國際商貿平台和新興產業平台等方面提出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機遇與角色；^⑦蔡赤萌則探討了香港在對接、參與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機遇、挑戰及原則與對策。^⑧

香港助推中國內地及珠三角地區的產業轉型升級，是兩地經濟關係研究的另一關注焦點。華曉紅從三次國際產業轉移浪潮來闡述香港是內地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橋樑”；^⑨張燕生等從服務業和製造業兩個方面，闡述了香港在內地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推動內地產業轉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並對如何更好發揮香港推動內地產業轉型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⑩Naubahar, S. & Mitchell, M. T. 從管理、技術、政府政策和投資等方面分析了香港在內地製造業現代化中的推動作用；^⑪Tjia & Yin Nor 指出香港發達的航運物流業在促進內地轉口貿易的同時，將內地與全球供應鏈連接起來，推動內地物流產業發展。^⑫陳廣漢等在研究香港經濟轉型結構變化基礎上，探討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香港與內地經貿關係的發展動態。^⑬

近 10 年來，有更多的研究聚焦香港在國家金融開放尤其是人民幣國際化中的獨特作用。莊芮芮分析了香港與內地金融互動的新特點，提出香港要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試驗平台和聯繫國內外金融市場的重要紐帶；^⑭馬駿基於離岸市場發展和資本項目開放的國際經驗和理論依據，強調了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功能和定位；^⑮石巧榮認為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在促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分流內地過剩流動性、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開放、降低企業的匯率風險和融資成本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⑯Vanessa Rossi & William Jackson 分析了香港在內地企業海外融資和海外投資中的紐帶作用；^⑰R. Sean Craig 等從中國外商投資（FDI）、中國海外直接投資（ODI）、中國合格境內投資者（QDII）、人民幣跨境支付等方面論述了香港在內地資本項目開放中的作用。^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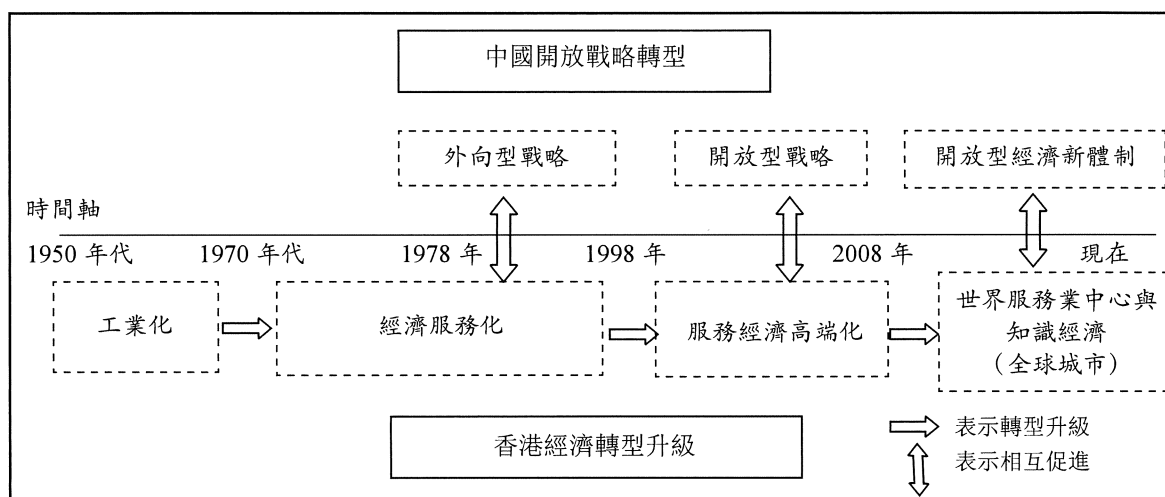
現有公開發表的研究具有幾個特點，第一，從早期以介紹香港經驗、跟蹤梳理香港服務內地改革開放的情況為主，逐步過渡到結合國家五年發展規劃、產業發展戰略、國際政經環境變化來前瞻性地論述香港的機遇及香港應扮演的作用；第二，研究體系初步形成，有宏觀領域的綜合性研究，也有具體產業、特定領域的微觀研究，問題導向型的研究也在增多；第三，與其他經濟學科相比，內地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豐富程度相對不足，其中與政府及行業不少內部研究未作公開、香港本地文獻檢索困難也有關係；第四，以內地因素為視角，系統審視內地改革開放發展演進對香港經濟關聯影響的綜合性文獻相對較少。我們認為，要真正認識香港發展與中國內地發展之間的關係，需要從內地改革開放戰略調整、經濟結構調整與香港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之間的動態關係

之中去探尋，香港未來的出路也要從中國內地對外開放戰略轉型中去探尋。

二、中國對外開放戰略調整中的香港：功能、轉型與升級

改革與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中國發展的兩大主題，兩大主題之間密切關聯，互為因果。漸進式改革和開放的基本策略，決定了中國改革和開放採取了分步走的發展模式。^⑨從 1978 年十年文革的重創中百廢待興，到 2010 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內地歷經近 40 年的改革開放實踐，經濟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對外開放戰略不斷升級，在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中探尋中國富強之路。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史，基本可以劃分為外向型發展戰略、開放型經濟發展戰略、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三個重大戰略時期。不同戰略時期，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功能不同，承擔的歷史作用也不同。香港的功能伴隨著國家開放戰略的調整不斷升級，香港產業結構也在不斷轉型與升級（見圖 1）。

圖 1 中國開放戰略轉型與香港經濟轉型升級的動態互聯



（一）外向型發展戰略（1978～1997）中的香港“窗口”功能

外向型發展戰略是內地改革開放初期的發展模式，大體持續了近 20 年。該時期開放戰略具有以下特徵：一是採用“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外向型經濟是一種出口導向型的貿易戰略。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的基本功能是，通過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充分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獲得外匯資金進口機器設備，來提高本地的勞動生產率和管理水平。通過採取促進進出口各項政策，包括出口補貼、金融信貸支持、稅收優惠、土地等要素價格優惠，促進出口加工產業的迅速發展，形成“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對外貿易基本格局。這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起步階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通常採用的模式。二是實施外商投資優惠政策，大力引進外來資本投資。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內地資金十分匱乏，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十分落後。大力吸引外資，充分利用國外資金、先進技術與管理水平，成為外向型經濟的另外一個重要特徵。推動實施外商投資優惠政策，改善外商投資環境，成為各地招商引資的重點工作。該時期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推行超國民待遇原則，對外資的優惠政策不僅包括稅收優惠、財政補貼、土地（水、電等）使用價格優惠、出口補貼退稅等等，還包括讓渡部分國內市場。激勵型的引進外資政策促進了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擴張，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廉價優質的勞動力以及低廉的土地等自然資源使用成本

充分結合，促進了出口加工產業的迅速擴張，也使中國經濟具有強烈的外資依賴性特徵。三是以漸進性為原則推進對外開放。漸進性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特徵，對外開放的漸進性原則的主要表現：開放內容上，以出口與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為主；開放區域上，向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發區、沿江和沿邊開放城市傾斜的區域不平衡戰略，尚未推行全面對外開放。

在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時期，也即改革開放的前 20 年，香港尚未回歸，香港在這個時期的對外開放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既然不是全面對外開放，中國的對外開放需要一個窗口，而建國初期中央對港採取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戰略恰好為香港發揮“窗口”功能奠定了基礎。中國早期改革開放的步伐，基本上與香港的經濟發展同步。二者協同發展，香港成就了中國對外開放迅速打開局面，中國對外開放也成就了香港回歸前的繁榮與產業轉型。

第一，香港是內地發展對外貿易助推器、聯繫國際市場的主要窗口。發展對外貿易是對外開放的核心。香港是內地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在內地對外貿易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內地開始改革開放，到 20 世紀 90 年代，內地經濟騰飛，香港與內地的貿易額逐年上升，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1991 年），香港與內地貿易額在內地對外貿易總額中的比重高達 36.57%，其中，內地對香港的出口額佔比高達 45% 左右，內地自香港進口佔比達到 27% 左右（圖 2）。回歸前的香港，一直是國家對外開放名副其實的“窗口”。內地改革開放以及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促進香港轉口貿易重現興盛，連年大幅上升。從 20 世紀 80 年代起，香港轉口貿易一直保持著 30% 以上的年均增長率。1988 年，香港出口貿易超過港產品出口量，佔出口總值的 56%，成為香港經濟轉型的一個重要標誌；1994 年，以內地為來源地或目的地的轉口貨值，佔香港轉口總值的 91%。轉口貿易功能恢復，香港與內地的貿易在全球經濟復蘇緩慢背景下一枝獨秀，得益於香港在內地對外貿易中獨特的中介地位。香港在國際貿易領域的地位，是與其承擔內地最重要轉口港的功能緊密聯繫在一起的。^⑩

圖 2 中國對香港進出口佔對外貿易總額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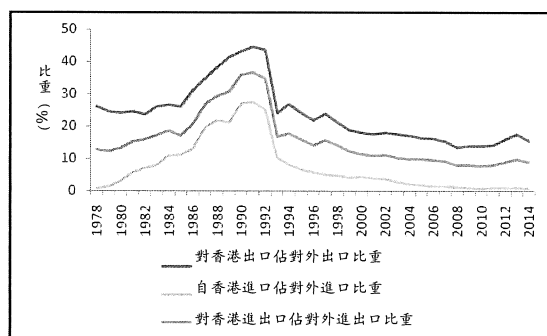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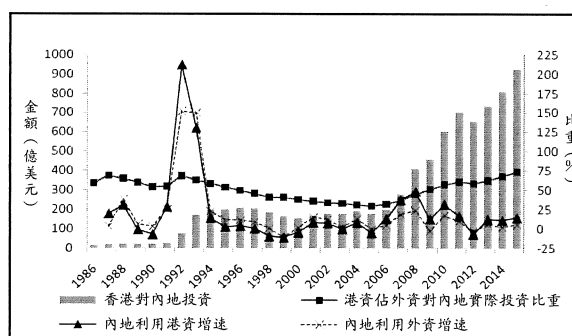


圖 3 1986 ~ 2015 年香港對內地投資金額及比重



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DOTS 數據庫（圖 2），wind 數據庫（圖 3）。

第二，香港是內地引進外資的主要來源。積極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核心之二。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採取了對外資極為優惠的“超國民待遇原則”。大量優質外資企業在內地投資辦廠，將資金、技術、先進管理經驗與中國內地的廉價勞動力、豐富的自然資源相結合，啟動了中國的經濟成長。外商直接投資是中國該階段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和源泉，香港一直是內地外商直接投資最重要的渠道來源。如圖 3 所示，在上世紀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在內地實際利用外商投資佔比中，來自香港的投資一直保持在 50% 以上，其間一度高達 70% 左右，為

內地經濟騰飛提供了第一桶金。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內地加快了全面對外開放的步伐，沿海開放城市加大在北美和歐洲的招商引資力度，外資來源趨於多元化。香港對內地實際投資增速在一度爆發性增長之後又直線下滑，佔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逐年迅速下降。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東南亞，亞洲經濟遭到重創，香港經濟也遭到嚴重打擊，當年香港對內地實際投資比重下降到46%，但仍然是內地最大外來投資者。這個時期內地改革開放對於外資的依賴，集中體現在對香港資本的依賴，港商在其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第三，香港是內地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橋樑。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與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緊密相關。內地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發展、製造業大國的形成功於成功承接國際產業轉移，香港在其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20世紀70年代前後，香港工業化轉型成功，實現了從以轉口貿易為主的自由港向以港產品出口為主的自由港跨越，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在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時期，內地薄弱的產業結構與香港的產業結構正好形成梯度差距，內地憑藉廉價勞動力和豐富自然資源，加之依託香港先進的管理經驗和自由港平台，很快融入國際產業轉移的浪潮中，承接香港紡織、服裝、玩具等輕工業，與香港成為“前店後廠”的模式。香港也開啟新一輪產業升級，大量勞動密集型紡織產業向內地珠三角地區轉移，在內地對外開放戰略配合下，珠三角地區迅速成為香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加工製造業基地，在全球奠定了“珠三角製造”和“世界工廠”的地位。在該階段，內地成功承接香港作為二傳手的二次國際產業轉移，促進內地對外貿易大幅增長，充分發揮了中國內地比較優勢，彰顯了中國的人口紅利，奠定了中國內地工業化的基礎，也實現了中國內地的資本積累。在這一過程中，香港經濟也實現了從工業化到經濟服務化的成功轉型。^②1997年香港服務業在本地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達到85.2%，^③這一數據在1980年只有67%。^④

（二）開放型經濟發展戰略（1998～2007）中香港服務經濟高端化的轉型升級

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標誌著東亞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失敗，也給中國外資依賴與出口依賴的外向型開放戰略敲響了警鐘。1997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五大會議召開，提出了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促進經濟結構優化。以效益為中心的多元化出口戰略、以國民待遇原則與服務業適度開放為特徵的引進外資戰略、進一步發揮特區引領與示範作用的多區域平衡開放戰略構成開放型經濟戰略的主要內容，顯示到改革開放進入第三個十年時，中國漸進性開放戰略由局部開放向全面開放過渡。其中一個重大標誌性事件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了全面對外開放的步伐。

開放型經濟發展戰略具有以下幾個特徵：第一，全面對外開放新格局。將第一個時期區域試點的開放政策在全國範圍內推廣，1999年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區域對外開放由東部沿海向中西部全面推開。第二，雙向開放戰略。對外貿易實施出口與進口平衡戰略，在大力促進進口的同時，不斷降低關稅和非關稅水平，擴大進口規模；外資戰略推動“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雙向開放戰略替代了第一個時期的“大進大出”戰略。第三，制度推動與主導。第一個時期的對外開放是由政策推動和主導，進入第二階段後對外開放升級為制度推動與主導。中國加入WTO，標誌著中國經濟體制與世界規則接軌。中國的對外開放逐步成為一種制度安排，表現為外資立法、外貿立法都逐步融入中國的投資法和貿易法中，成為中國經濟制度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從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長河中來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時期，是一個開創期，沒有歷史經驗可循，也沒有成熟的理論指導，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時期，臨時性、過渡性和實驗性的政策很多。第一個時期的巨大成功為第二個時期奠定了轉型升級和穩定

的基礎，推動了第二個時期堅定不移的、由法律制度保障的全面對外開放戰略的實施。

國家實施開放型經濟發展戰略時期，正值香港回歸後的首十年。在這個時期的對外開放中，由於全面對外開放逐步擺脫單一的出口依賴、外資依賴、特區依賴，香港的相對地位逐步下降。中國從依賴於香港單一窗口已經轉變為地理與區域上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格局了。香港作為內地對外貿易、投資和產業承接等傳統中介地位逐漸在弱化，而由政府層面推動的旨在消除兩地經貿往來交易成本的制度性安排，為深化兩地經濟合作拓展了新的空間。受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回歸伊始香港地產、股市泡沫破裂，經濟進入調整期，出現長達六年的通縮。為了幫助香港經濟盡快走出低谷，進一步發揮香港在內地對外開放中的作用，並助推香港經濟轉型升級，2003 年以來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陸續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 CEPA）及其補充協議，啟動逐步開放內地遊客赴港旅遊的自由行政策。CEPA 的簽署有助於逐漸減少和取消內地與香港之間所有進出口貿易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逐漸達到服務貿易自由化，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推進兩地經貿聯繫更趨緊密，最終形成香港與內地自由貿易夥伴關係。

在該階段，中國對外貿易的區域結構更加合理和多元化，對外貿易的單一國家（或地區）集中度在下降。香港在內地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中的比重也逐步下降。香港佔內地進出口總值的比重，從 1998 年的 14.0% 下降到 2007 年的 9.1%，最高峰值為 1991 年的 36.6%。2007 年，內地和香港分別為全球第三大和第十二大貿易體，內地是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而香港是內地第四大貿易夥伴，繼歐盟、美國和日本之後。^④香港資本在內地引進外資中的佔比從 1992 年的 68% 下降為 2006 年的 29.76%。^⑤香港依然是中國內地第一大外資來源地，維爾京群島、韓國、美國、德國等都是中國外資的重要來源地。

在這個時期，香港回歸、內地與香港簽署 CEPA、開放內地遊客自由行等政策對於促進 1997 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後香港經濟復蘇發揮了巨大作用；內地日益完善的製造業競爭力、龐大的服務貿易需求對於吸收香港產業轉移、促進香港後工業化轉型具有巨大推動作用。隨著內地改革開放戰略的調整，香港與內地的貿易投資關係進一步轉型升級。一方面，香港服務業大規模向內地轉移；另一方面，香港大力發展服務業出口，尤其是高端服務業，向服務經濟高端化轉型，國際金融中心、貿易與物流中心、商貿服務中心、旅遊中心功能進一步升級與轉型。

第一，旅遊業快速發展，拉動經濟走出復蘇並強化旅遊中心地位。香港回歸後，尤其是實施內地居民自由行政策之後，內地赴港旅遊迅速發展，推動了香港國際旅遊中心的建設。2003 年 7 月內地首批 4 個城市開通自由行，同年 9 月內地與香港簽署《關於開放服務貿易領域的具體承諾》，允許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十個地區的居民 2004 年起赴港旅遊。目前已有 22 個省（區、市）的 49 個城市實施了內地居民赴港個人自由行政策。自由行大力推動了香港旅遊業和相關行業發展。過去 10 年間，赴港或途徑香港的內地旅客人次上升超過 5 倍，平均每年增長 21%。至 2007 年，內地訪港遊客 1,549 萬人次，佔總訪港人次的 55%，而這一數據在 1992 年僅為 14.3%；^⑥其中循自由行途徑訪港的內地個人遊旅客達 859 萬人次，佔內地遊客總數的 56%。在旅遊業強勁增長的帶動下，房地產市場快速復蘇，香港經濟重拾增長。

第二，香港金融市場及融資功能迅速擴大，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注入新的動力。隨著內地對外開放的深化與對港金融需求的擴大，香港金融功能獲得新突破。在這一時期，香港和內地繼續保持互為最大直接投資者。此外，香港作為內地資金籌措中心的功能進一步加強。截至 2007 年底，共有 439 家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集資金額高達 3,712 億港元，香港股市基礎擴闊，區內主要集

資中心地位增強。2007年6月，香港首次發行人民幣債券，這是內地以外首個發行人民幣債券的地方，標誌著香港金融地位進入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第三，香港服務型經濟在輻射拉動內地經濟發展的同時獲得轉型與提升。隨著香港製造業向內地成功轉移，香港經濟迅速向服務化過渡，在內地服務貿易進口的強大需求推動下，香港的服務貿易迅速擴張，香港成為世界上三大服務貿易淨提供商之一，僅次於美國和英國。中國內地是全球服務貿易的淨購買者，保持著全球服務貿易逆差前三位。1997年到2007年間，中國內地服務貿易逆差從32億美元提高到76億美元。^④1997年到2006年間，香港服務貿易順差從763.98億美元提高到2,676.41億美元，提高了2.5倍。中國內地從香港的服務貿易進口額從1997年的528.34億美元提高到2006年的1,370.07億美元，提高了159%，同時超越美國躍居香港第一大服務貿易出口地，佔比達到24.7%。

內地服務業向香港投資者的開放，對於香港服務業的發展具有巨大促進作用，香港在內地投資服務業比重迅速上升。在改革開放第一階段，進入內地的主要是一些消費性服務業，如酒店、飛機餐飲服務等。但到第二個階段，在香港回歸和CEPA政策的推動下，生產性服務業開始大規模向內地轉移，行業擴大至電力、集裝箱碼頭運輸、物流服務、房地產及相關服務、商貿零售等。

在此階段，香港與內地的經濟互動關係，出現新轉變。一是低附加價值加工業逐步被取代。基於國際形勢轉變和自身發展需要，內地特別是珠三角地區正改變依賴以加工出口帶動經濟發展的模式，轉向發展高增值、高科技及自主創新的產業帶動經濟增長。二是“走出去”及“引進來”的橋樑角色在增強。內地已是香港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者。大量內地企業在香港設立公司，尋求國際銷售網絡平台、進行多種類型的海外直接投資和跨國併購。三是金融等服務業深化改革的窗口和試驗田功能需求日益增大。

（三）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2008年至今）中的香港金融開放試驗田

在這一階段，中國對外開放進入第四個十年。國家對外開放的視角，從充分利用世界資源、實現中國經濟發展向充分發揮中國資源、推動世界平衡發展轉變。2007年12月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拓展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有效結合起來，擴大開放領域，優化開放結構，提高開放質量，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2008年世界經濟和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經濟復蘇緩慢而不平衡。中國利用全球經濟調整的新機遇，實現了自身經濟的快速和穩定增長。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家，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在這個重大歷史時期，中國成為世界舉足輕重的力量，對外開放戰略重點，向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一更高領域轉變。

開放型經濟體系，是以科學發展觀為基礎，具有以下三大特點：第一，內外聯動的運行機制。從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視角看，內外聯動是一種經濟發展戰略，或者說是開放戰略融入經濟發展戰略的體現。從國家宏觀調控來講，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已經從國內資源擴展為全球資源的有效配置；從企業發展戰略來講，已經從國內市場與要素為基點上升為全球市場與要素的考量；從家庭資產配置角度看，已經從國內資產配置上升為全球資產配置；從經濟運行週期視角看，從關注國外環境對國內週期的影響上升為內外週期聯動的考量。第二，互利共贏的利益機制。為應對經濟全球化新形勢，2012年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明確全面提高開放水平，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

要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共中央、國務院 2015 年專門頒佈《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指出通過建立市場配置資源新體制、經濟運行管理新模式，實現全方位的開放新格局，形成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第三，積極參與國際治理體系。如果說，1978 年改革開放是向世界打開了國門，那麼在這個時期，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已基本融為一體。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已經從改革開放初的一個經濟弱國成長為一個經濟總量僅次於美國的大國；於世界經濟政治體系，已然從一個參與者、接受者轉變為一個設計者、引導者，而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也正在向一個與世界相融並能夠引領世界的方向變革。這正是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目標與實質。2015 年 12 月出台的中央“十三五”規劃建議的開放戰略明確提出，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改革完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積極引導全球經濟議程，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公平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

“一帶一路”戰略是我國新時期對外開放的新戰略，標誌著中國真正全面對外開放的時代來臨。2015 年 3 月，國務院三部委聯合頒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前景與行動》，是中國積極倡導並主動融入國際經濟合作的新模式。“一帶一路”貫穿亞非歐大陸、連接東亞經濟圈和歐洲經濟圈，形成陸海立體的區域開放網絡；在政策互通、設施互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個方面實現中國與沿線國家與地區的全方位合作。“一帶一路”戰略，使中國的對外開放從東部南部沿海、北部延邊擴展到東部、西部、中部、南部、北部直至中國任何一個地區，一個全面對外開放的國內外區域格局正在構建。新時期國家改革開放的新戰略，就是借助“一帶一路”實現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國內國外兩種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並與沿線國家發展規劃目標及多雙邊組織合作機制相對接，在更寬範圍、更高層次實現區域共同發展。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明確指出，擴大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開放合作。“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意見”明確指出，開創與港澳台合作的新局面。在該階段的開放戰略中，香港、澳門與台灣在中國開放型經濟新體系建設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這個時期，香港正處於向知識型經濟、全球城市轉型的階段中，香港中介地位與經濟功能因應外部環境變化尤其是中國內地的快速崛起而不斷演變中，相對優勢發生改變。一方面，由於香港創新產業不足及高端製造業缺失，導致香港無法引領內地產業製造業結構調整與升級；香港傳統中介功能優勢因腹地經濟逐步游離於香港傳統服務業而出現持續下降，繼轉口貿易後香港轉運也開始下降，貨櫃港集裝箱運輸量增長滯緩相對排名逐年下降；香港總體經濟規模逐步被珠三角多個內地城市趕超，香港佔內地經濟的比重也持續大幅下降；香港經濟結構更加服務型化但傳統服務業面臨珠三角替代分流壓力。另一方面，伴隨著內地全面對外開放新態勢，香港的金融、投資和專業服務等產業優勢更加凸顯，其功能並隨著國家發展的需求快速提升。香港需要真正提升作為中國的核心城市，將內地經濟快速發展產生的強大資金需求與海外尋求高投資回報的資金高效對接；將赴海外進行併購投資的內地資金與海外投資項目進行高效鏈接；將國際貿易人民幣自主結算後形成的海外人民幣高效集中，形成龐大的人民幣離岸市場，並進一步將龐大的離岸人民幣有序倒流入中國內地；香港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在中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首先，香港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首選地與國際化營運重要平台。

對外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比較優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開始由商品輸出轉向資本輸出。2008 年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低迷復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2012 年以後中國成

為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2015年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對外投資國，2015年對外直接投資超過實際使用外國直接投資額，成為資本淨流出國家。企業“走出去”成為新時期對外開放的主要內容。在這一輪對外開放新浪潮中，香港因其毗鄰廣東的地理位置、相同的人文特色、同一的語言習慣、開放的自由港、優惠的稅收條件、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健全的法律環境，再次成為內地對外開放和企業“走出去”的橋樑和紐帶。

香港迄今為止一直是內地企業走向海外的首選地，是內地企業走向國際化的最重要平台。內地企業“走出去”，約有48%通過香港融資，近60%的企業以香港為跳板“走出去”。內地在這一時期對港直接投資金額逐年快速增加。2007年內地對香港投資流量為137.32億美元，2008年大幅度增長到386.4億美元，2014年這一流量已增至708.67億美元，2015年進一步提高到897.90億美元，相比2007年的水平增長了5.53倍，8年間年均增幅高達69.23%。在內地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中，內地對香港直接投資的佔比從2007年的51.8%提高到2008年的69.1%，經過2010～2011年短暫回調，到2015年達到61.6%。內地知名企業幾乎都在香港設有分支機構，內地企業駐港總部數量自2011年飛速擴張，到2015年已達到133個。

其次，香港是內地企業最重要的境外融資渠道和公司治理體制借鑒來源。

內地改革開放歷程，也是金融改革開放的過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自由開放的金融市場環境和完善的金融法制體系，不但拓寬了內地企業的籌融資渠道，而且還推動內地企業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香港發達的資本市場體系與成熟的監管體系為內地資本市場建設和監管體系完善提供經驗，促進了內地金融市場的規範化和法制化。截至2015年底，已有231家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融資額達463.31億美元，融資同比增速35.62%。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中中資股市值佔比一直在40%以上，最高時曾達到接近55%（2008年）。

第三，香港是內地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對外開放的試驗田和緩衝帶。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再次暴露了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勢在必行。以此為契機，中國政府啟動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經過對外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和外匯儲備大國，國家綜合國力大增，人民幣幣值穩定，在國際上認可度穩步提升，對外投資逐年上升，海外淨資產不斷累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資金供給的重要一方。所有這些都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扎實經濟基礎。當前人民幣國際化還不完全具備的條件在於中國金融市場尚未完全開放，資本項目還未能自由兌換。我們的研究證明，人民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國際化條件存在動態自我強化的規律，人民幣國際化可以採取周邊化——區域化——國際化的路徑。^⑩香港是人民幣國際化從周邊化向區域化進而向國際化過渡的核心。香港是人民幣國際化的起點。推動金融市場開放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香港是一個最優的試驗田。

香港已經成為中國境外最大的人民幣貿易和支付結算平台、人民幣最大的資金池和資產管理中心，基本確立了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龍頭地位。內地銀行2007年7月開始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2009年10月財政部開始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2009年7月，香港成為境外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首個試點地區。2010年香港機構獲准發行人民幣大額存單以及境外機構獲准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2010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管局簽署《清算協議》，香港人民幣清算中心成立，標誌著人民幣離岸市場取得實質性突破。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形成，標誌著中國人民幣區域化跨出重要一步。2011年之後，境外其他人民幣離岸市場也陸續發展起來，包括台灣地區、

倫敦和新加坡。但不論是從人民幣存款、貸款還是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規模遙遙領先於其他離岸市場。香港離岸人民幣存款在 2014 年 12 月份更是突破萬億大關，佔據海外人民幣存款總額的三分之一；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2015 年第三季度突破 2 萬億元，佔全部跨境貿易人民幣業務結算金額的 90% 以上；離岸人民幣貸款 2016 年 9 月為 3,074 億元；截至 2015 年底香港人民幣債券餘額達到 6,597 億元。

金融改革與金融開放，包括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人民幣國際化；國際直接投資戰略轉型，從單向吸引戰略向雙輪驅動戰略升級，培育一批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中國跨國公司；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實現資源的有序合理流動；所有這些都是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新時代攻克的重點和難點。香港在全面深化改革和開放的新時代擔當了試驗田和緩衝帶的重任，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然而，改革開放的車輪在繼續前進，自由貿易區試驗田在不斷推進，全面開放在提速，巨大的挑戰變化擺在了香港面前。

三、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與香港功能重塑

（一）新開放戰略下香港面臨的挑戰

新時期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基本要求是建立市場配置資源的新體制，建立公平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形成經濟運行管理新模式；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形成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為了實現這些基本要求，十八大以來對外開放的速度開始加快，在對外貿易中簡化進出口管理，推動貿易便利化；加快服務業對外開放，尤其是加快金融業對外開放；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擴大人民幣跨境結算，推動資本項下的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所有這些目標與要求付諸實踐的具體舉措是“一帶一路”戰略和境內自由貿易試驗區戰略。

“一帶一路”戰略將香港與上海、北京、深圳、天津、西安等內地重要城市一同置入全球城市鏈接的鏈條上，香港獨特的政策優勢和地理優勢受到挑戰；境內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設立，則將通過貿易便利化、投資便利化、金融市場開放創新等探索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與開放的路徑，促進中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建設。從當前四個自由貿易區建設來看，建設促進資本自由流動離岸金融中心，搭建離岸與在岸快捷、高效、可檢測、可控制的互流平台，擴大金融服務業外資准入，幾乎是四個自由貿易區一致的金融創新目標；通過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建設國際貿易中心與國際物流中心，也是四個自貿區不約而同的目標。2016 年國家又推出第三批 7 個自貿試驗區試點，在把握國際通行規則的基礎上，加快形成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

與此同時，在全面對外開放戰略的推動下，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建設也在世界各地不斷推進。除了香港之外，倫敦、台灣地區、新加坡、巴黎等都在爭奪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而中國人民銀行也在香港之外，澳門、台灣地區、新加坡等 20 個國家和地區批准建立了人民幣清算行。很多具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城市，如新加坡、倫敦、紐約、巴黎、法蘭克福、瑞士等都正在成長為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理論上來講，這些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都具有進一步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融資中心和平台的可能性。

如果說，在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香港的地位和功能已經突出變現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功

改革試點城市的興起，海外人民幣國際化趨勢推動的倫敦、紐約、法蘭克福、新加坡等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人民幣國際化中心的興起，都必然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與功能形成嚴峻挑戰。2016年世界知名智庫機構 Z/Y 公佈的全球 86 個金融中心的指數最新排名，倫敦、紐約繼續居世界前兩位，而之前一直穩居第 3 位的香港，則首次被新加坡超越，滑落為第 4 位。與此同時，中國內地城市的排名在上升，上海排名第 16 位，上升了 5 位；深圳排名第 19 位，上升了 4 位；北京排名第 23 位，上升了 6 位。在現實競爭環境下，香港面臨不進則退的處境。

（二）香港功能重塑

在中國新開放戰略下，香港的出路在哪裡？答案是：轉型與升級。在提升航運、貿易等傳統中心功能基礎上，重點推進國際金融中心新內涵，打造高端專業服務新平台。

第一，促進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向中國的全球金融中心轉型升級，同時配合“一帶一路”戰略提升香港離岸中心的門戶地位和樞紐功能。

作為中國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突出表現為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功能、中國資本市場開放窗口與試驗地功能、中國企業投融資服務中心功能、全球資金管理中心功能。這些功能是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目前香港都已具備條件及佔先優勢，其他內地城市與海外城市都無法與之比擬。當前，人民幣國際化正進入一個新階段，從重要的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向重要的國際投資及儲備貨幣轉變，“人民幣”境外循環模式發生轉變，資本項目成為人民幣流動性輸出的主要載體，其中內地居民調整財富結構，全球資產配置需求殷切，將成為資本項目下對外輸出流動性的主要力量。在這一背景大下，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也將面臨新的轉變，需要拓展新功能。一是發展離岸市場功能的著眼點，要從前一階段的規模擴張轉向鞏固市場的深度和有效性。發展動力由主要依靠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境內外套利交易等，轉向發展金融產品的豐富和深化，提供更多與人民幣全球配置和跨境流動相適應的市場工具和管理手段。二是成為內地經濟金融結構調整的風險管理中心。管理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後面臨的匯率波動風險，重塑人民幣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模式和角色，為中國企業全球化佈局、參與“一帶一路”沿線項目管理海外投資風險。三是發揮好連接內地與全球的最重要的雙向平台和離岸人民幣樞紐功能。滬港通和深港通的先後啟動，香港市場已與深圳和上海市場連接為一個 70 萬億市值的巨大“共同市場”。未來這個互聯互通的框架將繼續拓展到新股通、債券通和商品通等其他產品領域，將進一步強化香港作為門戶市場的關鍵地位，需要香港為內地資金進行國際化配置以及國際資本進入內地資本市場投資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和平台。^⑨

與世界兩大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紐約與倫敦相比，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劣勢主要有兩個：一是經濟體量小，經濟腹地狹窄；二是金融市場結構單一，債券市場規模、金融衍生工具與大宗商品交易等方面明顯不足。要克服這兩大問題，香港必須以中國內地為經濟腹地、搭乘“一帶一路”戰略，破解經濟體量小的約束。只有在內地巨大的經濟體量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體量支撐下，才會產生巨大的金融衍生產品需求，也方能構建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將香港的資本市場和金融服務業面向中國經濟的需求，面向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需求，建設成為中國的全球金融中心。

要提升國家的全球金融中心這一目標，面對來自內地城市上海的競爭，來自亞洲東京、新加坡的競爭，香港的出路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制度設計、業務發展、市場結構、政策支持、組織實施等方面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保持高度一致，與中國內地經濟發展的需求保持高度對接，

與內地城市形成優勢互補、密切銜接、互利共贏的區域合作關係；同時，香港需要進一步提升在自由港政策、稅收政策、法律體系、人才隊伍、商業環境等方面的優勢。簡言之，就是在善用香港獨特優勢與善用祖國內地優勢的基礎上提升香港獨特優勢，緊跟國家改革開放新方略，建設中國的全球金融中心。

第二，推動香港國際貿易中心與國際物流中心向全球供應鏈管理中心轉型升級。

香港一直是亞太地區最著名的自由港和貿易轉口港，貿易及物流一直是香港的優勢產業。隨著香港製造業大量外移、產業趨向空心，香港貿易方式逐步從轉口轉為轉運，目前已進一步離岸化。香港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持續上揚、貿易物流成本持續上升、經濟下行壓力有增無減，加上內地諸多港口城市的快速發展與貨源分流，進一步導致香港國際貿易和物流中心地位的相對弱化。香港國際貿易與航運物流轉向非實體化發展，保持和提升中心地位任重而道遠。

在香港國際貿易與物流中心的轉型升級中，關鍵要抓住三點：其一，積極拓展中國內地和全球新市場，搭乘“一帶一路”快車，全面鏈接“一帶一路”的節點國家和城市，建設中國內地全面對外開放的傳送帶；其二，積極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物流中心和國際自由港的優勢，挖掘離岸貿易進一步擴張的潛能；其三，提高國際貿易增值服務水平，打造全球供應鏈管理服務中心。香港可借助國際貿易中心的基礎條件與港口營運經驗，將服務延伸至中國內地市場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市場，這是一個具有無限潛力的市場。香港傳統的國際貿易商已經在向全球供應鏈管理服務商升級，承接了全球生產鏈條的大部分環節，涵蓋生產商與供貨商選擇與管理、供應鏈融資、產品生產與設計、市場營銷、售後服務等等。國際貿易商利用其長期積累的與生產商、供貨商、品牌商、銷售網絡、金融機構的密切合作關係，從設計、生產、銷售、融資服務的中介提升為整個供應鏈條的管理者。這是從貿易商向供應鏈管理服務商的跨越，香港應該通過政府政策支持、行業協會指導推動等措施，推進其進一步轉型升級。隨著“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建設和新供應鏈的形成，全球經濟貿易版圖將發生變化，未來全球新的經濟增量將大幅轉向中國西部的亞歐和印度洋方向。香港應未雨綢繆，調整策略重點，拓展新供應鏈網絡，為貿易中心與航運物流中心增添新動能。

第三，打造高端專業服務新平台，發揮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新時期中的特定優勢。

對於國家而言，香港目前的優勢，並非其經濟體量，而在於軟實力，在於其高端專業服務業的優勢。除金融外，香港的專業服務提供者如法律、會計、仲裁以至運輸系統管理等均達到國際標準。一是增強中國與世界的資本流動中的中介角色，發揮配置全球戰略性資源和提供資源流動的主要通道之功能。二是借助香港優勢條件吸引全球發達服務業在香港集聚，成為高端服務業的積聚中心，成為“一帶一路”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中介。三是強化地區總部功能，成為全球互聯互通中的供應鏈主要節點和樞紐。四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設立爭端解決機制與仲裁中心功能，為“一帶一路”及區域發展提供法律服務。五是利用香港服務業綜合優勢，助力國家參與全球治理，提升國家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

未來，香港經濟功能重塑的重點方向是，強化作為全球城市的主體功能，提升服務業能級。結合“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配合國家開放戰略的發展，延伸專業服務範圍，在服務國家發展中獲取自身持續增長動力。一是打造全球金融中心的機能，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資產管理中心功能；二是逐步打造以貿易物流為介質的全球生產控制中心，借助粵港區域合作和國家走出去戰略，加快培育創新及科技產業，夯實新供應鏈網絡的實體經濟基礎。

- ①馮邦彥：《香港在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北京：《經濟研究》，1989年第4期。
- ②高祀仁：《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地位和貢獻》，北京：《求是》，2009年第1期。
- ③香港策略發展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蔡赤萌主編：《港澳經濟年鑒2010》，北京：港澳經濟年鑒社，2010年，第399~410頁。
- ④封小雲：《“九七”後香港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載劉澤生主編：《邁向新紀元——“九七”香港回歸專家談》，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7月，第393~394頁。
- ⑤張明：《十年來香港地區與大陸之間貿易與資本流動的結構性變化——基於國際收支框架的分析》，北京：《國際金融研究》，2009年第2期。
- ⑥Yun-wing Sung,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China's Export Driv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January 1986.
- ⑦林健忠主編：《“一帶一路”與香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
- ⑧蔡赤萌：《香港對接“一帶一路”：原則與策略》，長春：《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5期。
- ⑨華曉紅、鄭學黨：《港澳台—中國對外開放的獨特優勢》，成都：《經濟學家》，2012年第7期。
- ⑩張燕生、劉旭、陳長纓：《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國際貿易》，2007年第12期。
- ⑪Naubahar, S., Mitchell, M. T.,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Mainl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Manufacturing, *Asian Survey*, August 2011.
- ⑫Tjia, Yin Nor, Hong Kong's Role in Mainland China's Logistics Industry – From Physical Gateway to Differentiated Service Provider, *Asian Survey*, August 2011.
- ⑬陳廣漢主編：《香港回歸後的經濟轉型和發展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 ⑭莊芮：《香港如何在內地新一輪金融開放中發揮作用》，深圳：《開放導報》，2006年第4期。
- ⑮馬駿：《人民幣離岸市場與資本項目開放》，北京：《金融發展評論》，2012年第4期。
- ⑯石巧榮：《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的經濟效應考察》，福州：《亞太經濟》，2011年第5期。
- ⑰Vanessa Rossi, William Jackson, Hong Kong's role in building the offshore renminbi market,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rogramme Paper*, January 2011.
- ⑱R. Sean Craig, Changchun Hua, Philip Ng, Raymond Yuen, Development of the Renminbi Market in Hong Kong SAR Assessing Onshore-Offshore Market Integration, *IMF Working Paper*, December 2013.
- ⑲戴金平、張成祥：《我國漸進式金融改革：發展與修正》，天津：《南開學報》，2014年第5期。
- ⑳陳多、蔡赤萌：香港回歸叢書《香港的經濟（一）》，北京：新華出版社，1996年，第86頁。
- ㉑馮邦彥：《香港產業結構第三次轉型：構建“1+3”產業體系》，北京：《港澳研究》，2015年第4期。
- ㉒資料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年刊1998》，香港，1998年，第341頁。
- ㉓資料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年刊1986》，香港，1986年，第110頁。
- ㉔陳多主編：《港澳經濟年鑒2008》，北京：港澳經濟年鑒社，2008年，第101、636頁。
- ㉕資料來源：香港萬德數據庫、經濟數據庫、中國宏觀數據。
- ㉖資料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年刊（1992~2008）》。
- ㉗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服務貿易和商貿服務司：《中國服務貿易統計2015》，中國服務貿易指南網，<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index.shtml>
- ㉘戴金平、靳曉婷：《漸進性人民幣國際化中的香港地位——兼論人民幣國際化的動態路徑選擇》，深圳：《開放導報》，2011年第3期。
- ㉙巴曙松：人民幣國際化的新階段與香港的機會，在出席“香港經濟峰會2017”上演講，2016年12月1日。載中國改革論壇，http://people.chinareform.org.cn/B/bss/Article/201612/t20161204_258564.htm

作者簡介：戴金平，南開大學國家經濟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天津 300071；蔡赤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045

[責任編輯 劉澤生]